

A Study of China-EU Cooperation

中国—欧盟 合作研究

郭关玉 著



World Affairs Press

世界出版社

国际合作研究丛书 程又中 主编

中国—欧盟合作研究

郭关玉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欧盟合作研究/郭关玉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11

(国际合作研究丛书/程又中主编)

ISBN 7-5012-2995-3

I.中... II.郭... III.国际合作—研究—中国、欧洲联盟
IV.D8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2628 号

书 名 / 中国—欧盟合作研究

责任编辑 / 姚少春

文字编辑 / 龚玲琳 马武业

封面设计 / 姚少春

责任出版 / 林 琦

责任校对 / 李 琴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 65265923

网 址 / www.wap1934.com

邮政编码 / 10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世知萨隆文化交流中心

印 刷 /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 880 × 1230 毫米 1/32 9½ 印张 255 千字

版次印次 / 2006 年 1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项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
项目和华中师范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的资助**

丛书总序

在人类历史上，以团结合作的方式抵御天灾人祸、谋取可供分享的共同利益，一直是个体的人、部族、民族或国家的主观愿望和实践努力。政治社会的一个最重要功能，就是设法解决私人及其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在合作中形成的力量应对面临的各种共同问题，争取实现最美好的理想。国内社会如此，国际社会亦然。不过，与国内社会具有公共权力机构从而具有实现合作的主导力不同，国际社会没有这样的公共权力机构，因而国际社会的合作需要包括国家在内的各行为体在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加强交往的基础上，增信释疑，求同存异，会聚预期，扩大认同，形成规范，友好协作。

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国际合作，世界各国只有在互利合作中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与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一方面，世界经济稳步增长，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产业重组和生产要素流动转移加快，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另一方面，南北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加剧，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使人类社会的共同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正如胡锦涛主席 2006 年 4 月访美时所指出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必须用广阔的全球视野来审视周围的一切，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只有加强交流合作、相互借鉴，国际社会才能趋利避害、携手共进；只有通过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国人民才能共同开创和谐、繁荣、美好的未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要实现发展的任务，必须顺应天下大势，与各国相互信任、和睦相处，与各国人民一道承担起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共同责任。对此中国已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国家领导人不断阐述的一项重要政治主张，就是“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实践这一主张，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其精髓之一就是，中国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国友好相处。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中国积极参与反恐和防扩散合作，努力维护全球安全与战略稳定；中国在朝核、伊核、中东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贯持劝和促谈的立场，就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对重大自然灾害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中国认真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真诚无私的援助。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大幅度降低关税，积极开放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领域，从而促进了合作方、地区的经济繁荣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给合作伙伴国的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将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商机。在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处理上，中国已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建设性、战略性、全面（战略性）合作与伙伴关系，并致力于这种关系的长期

稳定；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近300个国际条约，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做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等，推进双边和区域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永远是世界各国人民真诚、可信、可靠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过去和当前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现象，早就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国际关系主要学派的不同解释。粗略看来，由流行于当代的功能主义、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所作出的这些解释，大体上涉及对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否可能和如何实现、国家之间开展合作的障碍是什么、国家愿意合作的目的是什么、国家之间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实现合作、何种条件对于成功实现国际合作最具决定性意义等问题的不同回答。依据这些回答的要义，我们不妨分别称之为“技术合作论”、“权力合作论”（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文化合作论”和“社会合作论”。诚然，西方这些各具特色的国际合作理论，在深化对国际合作现象的理性认识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但并非不无缺陷，同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在争论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全球化使中国和世界发展所依赖的国际合作处于一个新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上的国际合作，无论是参与合作的主体、有利于合作的条件，还是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合作的影响和意义，等等，事实上都不是现有的理论所能充分解释得了的。为了全面了解新的国际合作现象，具体分析国际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国际合作的发展趋势，同时认真思考中国正在从事的各种国际合作，也就是说从实际出发进一步理解和推动国际合作，我们不仅必须放眼世界范围内的国际

合作，对国际合作做整体的调研尤其是基本的理论思考，还必须就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里的中国与外国、外国集团和国际组织所开展的国际合作做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创新思路，为拓展和深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国际合作寻求因应之策。这是时代和中国的发展需求向学术界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虽然非几个人在短时间内所能做到，但却可以由几个人开个头，出点力。

有了上述想法后，三年前我们先后论证并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和“211工程”建设课题。自课题申报成功并得到相应的资助起，由我领衔、由学有所成的年轻教授和博士参加的课题组，在“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课题的框架内开始了研究工作。选取的第一批子课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研究”、“现有国际合作理论批判与当前国际合作理论建构”、“观念因素与国际合作”、“中国的国际合作战略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国际安全合作与中国”、“国际金融合作与中国”、“欧盟的发展与中国和欧盟的合作”、“东盟的发展与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等。经过大家的努力，各项子课题的研究在立项三年后告一段落，研究成果现在分别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并由它们共同构成一套“国际合作研究丛书”呈现在大家面前，接受评判。

在《国际合作理论：批判与建构》一书中，作者宋秀琚博士对西方国际合作理论进行了批判，分析了它们在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不足，认为受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这些理论反映的主要是大国强国的自身利益，并不具有普遍性。为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国际合作理论，作者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设：第一，国际关系就是国家能力间的关系，国家能力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总体态势。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直接目标是通过各种方式或弥补或增强自己的能力，国家能力趋同和能力自主是国家的

不懈追求。第二,国家一旦产生,就会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自主性和生存能力,国家参与合作的目的正在于此。第三,国家能力是国际合作的出发点,也是国际合作的最终归宿。由此,作者建构了一种以“国家能力—国际合作”为主导模式的国际合作理论。该理论模式提出了国家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参与具体的国际合作、国家应以增强或弥补自身能力为参与国际合作的目的等主张,同时包含了对国家观念和国际社会诸要素等国际合作干预变量及其作用的分析。

夏建平博士的《认同与国际合作》一书从认同的内涵与建构过程着手,探讨了认同对于国际合作的意义。作者指出,良性的认同可以建构出一种合作关系并且使合作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又反过来加深了良性的认同并促进了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认同与合作在互动中不断内化,螺旋上升,从而使国际合作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至于说行为体之间如何在互动中建构良性认同从而促进合作的问题,作者除了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讨外,还以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国与美国的互动实践为例做了实证方面的分析。在考察了中国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调整、逐步建构起与国际社会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良性认同、从一个体系外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并且广泛地参与国际合作的进程之后,作者指出:中国将继续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树立和平、发展、合作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断扩大与国际社会的良性认同,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既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又促进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在《当代国际安全合作的探索与争鸣》一书中,作者李学保博士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方面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认识,选择从新安全观及国际社会对它的不同理解切入,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安全合作及围绕国际安全合作所发生的争论、国

家主权因素和新安全问题对当代国际安全合作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有关问题。作者在其著作中全面考察了国际社会对新安全观的阐释和存在于其中的歧见;深入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当代国际安全合作中的主权因素的不同认识;探讨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安全合作的深远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梳理了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历史进程、基本原则和战略考虑,并就当前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有关问题抒发了自己的见解。

国际金融合作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而仅仅借助经济学理论或政治学理论,不仅难以充分理解国际金融合作对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意义,也难以深化对一国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的作为的认识。鉴于此,在《国际金融合作:一种权力与利益的分析》一书中,赵长峰博士尝试运用多学科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以国际金融合作的历史发展轨迹(主要是“二战”后)为线索,以权力与利益及其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的体现为主轴,以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各种问题为变量,考察了国际金融合作中复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分析了国际金融合作的利弊;并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促进国际金融合作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应持有的权力和利益诉求,分析了实现这种诉求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实现这种诉求的可行途径。

韦红教授在《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一书中,着重考察了中国—东盟合作在东盟各层次地区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作者认为,冷战后东盟地区主义呈现出“同心圆式多层次”发展趋势,即以东南亚为核心,逐渐扩展为东南亚、东亚、亚太三个环形层次。中国—东盟合作在各层次地区主义中都居于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而且还是推动各层次

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杠杆；尤其在东亚地区，中国—东盟合作如同欧洲的法德合作，将是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核心力量。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对“权力与地区主义”、“利益与地区主义”、“冲突与地区主义”、“多元性与地区主义”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

在《中国—欧盟合作研究》一书中，郭关玉博士提出关于成功推动国际合作通常须有三大动因和六项条件的理论假设，通过对中国与欧共体、欧盟合作历史的回顾和对中国与欧盟合作现状的透视，从经济、政治、安全和观念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冷战后中国与欧盟合作的动因，以及双方合作比较顺利的六项条件：（1）中国与欧盟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2）中国与欧盟都认识到了双方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3）中国与欧盟双方在合作中做到了互利互惠；（4）欧盟的独立自主性在冷战后大大增强；（5）中欧之间政策协调过程比较畅通，双方合作机制逐渐完善；（6）中国与欧盟都能对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争端采取比较理性的处理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作者也就目前干扰中、欧合作的若干因素和如何排除干扰、深化合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国际合作中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既是中国自身的愿望，也是国际社会的期盼。胡宗山副教授在《中国的和平崛起：理论、历史与战略》一书中，从理论、历史和战略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该书认为，“能力决定意图”、大国崛起后必然会寻求改变现状等现实主义教义存在重要缺陷，不足以解释历史上的所有大国崛起现象。在历史上存在和平型和暴力型两种主要的大国崛起道路，前者以内部的经济增长和制度、技术创新为主要动力，后者则以对外武力扩张、掠夺资源和争霸为主要动力。近代史中大国的经验表明，大国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即

使通过暴力方式崛起的国家中，也存在非常重要的非暴力因素。同时，大国崛起并不必然会成为修正主义国家而试图推翻现有体系甚至发动战争。英国和美国的崛起之路表明，国家即使在拥有较强的力量之后也可能会温和地对待现有的国际体系，关键在于国家自身如何正确地处理自身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因此，即使在被称为强权政治的近代国际关系中，并非所有国家都是通过战争崛起，大国崛起之后也并非都要进行武力争霸。即使根据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千年不变的循环论主张，21世纪中国实现和平式崛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对外行为表明，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不谋求霸权的国家，更不是所谓的反体系运动者。因此，中国未来的和平式崛起和崛起后维持世界和平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制定正确的崛起维持战略和应对战略，保障中国的和平崛起顺利实现。

我们深知，无论是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还是中国日益广泛开展和深入其中的国际合作，都是一个很大且问题不断出现的领域。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受资料收集和自身学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本丛书所表述的观点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与此同时，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国际合作的成果问世！

程又中

2006年5月1日于华中师范大学

序 言

国际合作同国际冲突一样，是国际社会非常古老、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自国家诞生之日起，国际合作和国际冲突就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时刻紧密伴随。

15 到 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大大方便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从而也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各国之间的联系已经相当紧密。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开篇中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苏联解体，全球性统一大市场重新统一、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以及国际组织协调经济能力增强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与依存、相互渗透与扩张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而且还使安全问题国际化。一国的安全已与整个世界的安全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要解决诸如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疾病传播等全球性安全问题，国家之间必须携起手来。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是无法单独解决以上问题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维护安全，国家或国际组织都需要参与国际合作。

^①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3 版），【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页。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发展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一直始终不渝地对外开展合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对外合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不仅在经贸、文化、科技领域广泛开展对外合作,而且在行政、司法、安全、人权等比较敏感的领域也积极开展对外合作。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从此,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一起,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合作在中国外交和发展战略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众多的合作伙伴中,欧盟是非常重要的且比较独特的一个。说欧盟“重要”,是因为它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联合体。中国与欧盟合作,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欧盟是当今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国际组织。中国与欧盟合作,能够获得我国快速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其次,欧盟同中国一样,是正在崛起的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2004年,欧盟扩大到25个国家,面积达到400万平方公里,人口4.5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由于实力超群且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欧盟也是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需要合作的对象。第三,冷战结束后,由于来自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消失,美国对欧盟的安全战略意义减弱,欧盟开始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共治世界的权力。在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中,欧盟主张世界多极化,这与我国对未来世界格局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中国与欧盟进行合作,还能在推动多极化的进程中相互借重。最后,欧盟综合实力比我国强大,且与我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在与欧盟的合作中,存在若干需要认真研究和处理的复杂课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摸索和总结一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如何顺利实现合作的经验,并用于指导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说欧盟

“独特”，是因为其既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国际组织，而是一个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联合体。中国与欧盟要成功合作，必须摸索、总结一些适合欧盟决策机制的新的经验。

在学术界，近几年来，对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的学者和成果都在逐渐增多。但是，目前比较全面地对中国与欧盟合作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本人尝试着在此领域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在读者阅读本书的正文之前，我想在序言部分交代清楚两件事情，一是本书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即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的动因、国际合作的条件；二是欧盟的发展历程。本书研究的是中国与欧盟这个整体的合作，而不是与欧盟个别成员国的合作。尽管对于专门研究欧洲、欧盟的学者来说，欧盟的发展历程早已烂熟于心，我的介绍可能是多此一举，但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了解一下欧盟的发展历程之后再来看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合作，可能更加清楚明了。

何谓国际合作，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概念。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是这样概括的：“通过政策协调过程，当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用更加正规的语言对此做一总结，就是：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它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① 该定义强调国际合作是一个政策协调过程，将合作与和谐区别开来。但是，该定义也有一个缺陷。它强调国际合作的主体是国家，这就将广大的

^①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62 页。

其他国际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政党等排除在外。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是这样定义国际合作的：“当行为体为了回应或预期其他行为体的偏好，而调整自身行为时，合作就可能产生。国家可以在明确的或默认的讨价过程中商讨进行合作。合作也可能是强弱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① 该定义同样强调国际合作是一个政策协调过程，并且指出了国际合作有平等或强制两种。李少军的《国际政治学概论》则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合作是指国际行为体在互动中自愿调整其政策的行为，目的是协调各方的不同点，以达到一种共同得益的结果。”^② 该定义也强调国际合作是一个政策协调过程，并且指出国际合作的目的是共同得益。梁守德、洪银娴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主张：“国际政治中的协调与合作，指的是国家和国家集团间程度不等的利益一致和目标相似的默契与联合。协调只是一种默契，不一定有正式文件为依据，其作用是临时性的，可变性大。合作必须建立在正式文件的基础上，或签订协议、条约，或建立联合组织，或采取共同行动，其作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③ 该定义不仅指出了合作的动力是“程度不等的利益一致和目标相似”，而且从建立正式文件的方面严格定义了国际合作。刘金质、梁守德等主编的《国际政治大辞典》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国际合作进行了定义。该书认为，所谓国际合作，是指国家或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由于一定领域内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而进行不同程度的协调、联合

①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543 页。

② 《国际政治学概论》，李少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203 页。

③ 《国际政治学理论》，梁守德、洪银娴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221 页。

和相互支持的行动。^①

根据上述学者的定义和笔者的理解,本书所讲的国际合作,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国际合作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国际组织等其他国际行为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非国家的国际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将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国际合作之外,将使国际合作的范围大大缩小,从而不能反映当今国际合作的现实。第二,国际合作是出于国际行为体的自愿,而不是出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强迫。第三,合作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既可以是口头上的相互支持,也可以是实际行动中的相互配合;既可以是行动中的相互协调,也可以是正正规规地签订协定,并据此进行的合作。第四,国际合作的原因并不只包括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利益或目标一致或部分一致,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如国际行为体受到某种自己单独无法解决的国际环境压力而寻求国际合作等。第五,国际合作是一个政策协调过程,而不是一种共同利益压倒冲突的状态。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本书将国际合作定义为: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因为某种或某几种原因,自愿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对方方的偏好,而与对方进行不同程度的协调、联合或相互支持等行动。

动因,指导致某事实或状态发生的各种原因。本书所指的国际合作动因,既包括推动国际行为体进行合作的内部原因,也包括推动国际合作的外部原因。

在汉语中,“条件”一词通常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为某事而提出的要求或规定的标准,如政治条件;二是指制约事物存在和

^① 《国际政治大辞典》,刘金质、梁守德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